『好地方』今朝更好看

“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这是1929年5月,毛泽东重返大柏地时对瑞金的赞赏。毛泽东还说:“我们上次在这里打仗借了老百姓很多东西,这次一定要偿还。”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1929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向赣南进军,意图通过“围魏救赵”策略解井冈山之围。红四军沿赣粤边界的深山老林行走,风餐露宿,处境十分艰难,沿途还遭遇国民党军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的围追堵截,屡次陷入险境。

在大余,与李文彬旅激烈交火时,红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牺牲。在寻乌吉潭圳下村,又遭刘士毅部偷袭,红四军伤亡很大,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受伤被俘,后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四军历经艰苦转战,于2月9日抵达瑞金大柏地境内。当天正值农历除夕,战士们强烈要求与追敌决战。然而红四军下山以来,所带经费与干粮消耗殆尽。当时,老百姓家里年夜饭都已备好,但是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百姓都躲到山上去了。红军纪律严明,老百姓不在家,不敢随便动他们的东西。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江华向毛泽东等人建议,暂时借用老百姓的粮食做年夜饭,写上借条,日后归还。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经过反复商量,最后毛泽东拍板:“只好如此!”红军取用粮食后,留下借条承诺日后归还。

大柏地在瑞金城北30公里,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是一道南北走向、长约6公里的峡谷。两旁山高岭峻,一条曲径绕行谷底,直通宁都。鉴于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斗志昂扬,毛泽东、朱德分析地形后,认为大柏地峡谷地势险要,适合伏击,决心在此打一场伏击战。

毛泽东、朱德在大柏地王家祠召开战前动员大会,讲明了此次战斗的重要意义。按照战斗部署,兵分三路,隐蔽待敌——红二十八团和特务营埋伏在麻子坳、杏坑右边山上的丛林之中;红三十一团埋伏在麻子坳、杏坑左边山上的丛林中,相机迂回至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和增援,同时分一部分人假装挑夫,负责把敌人诱进伏击区内;另以一个营的兵力,从正面袭击敌人。

红军利用峡谷地形布下了“口袋阵”,由萧克率部诱敌深入。待敌人全部钻进红军设下的伏击圈,进至杏坑北侧时,战斗打响。战斗中,因红四军弹药不足,火力薄弱,双方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朱德指挥独立营和直属队向山下猛冲。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把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红军两位首长亲临战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经过一天一夜鏖战,歼敌3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取得红军转战赣南后的首场大捷。

扫码详阅视频

大柏地战斗是绝境求生的关键一战,也是红四军下井冈山挺进赣南的首次大捷,被陈毅赞誉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这场胜仗,既是红四军带给赣南人民的新年贺礼,也为红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拉开了序幕。

战斗结束后,红军离开了大柏地,但是红军没有忘记许下的诺言。几个月后,红四军从闽西回师路过大柏地。据瑞金市大柏地乡大柏地村村民王桃生回忆:“当时红军在打仗的时候,借用了老表的粮食、物资。听我爷爷讲,毛泽东第二次到大柏地来,在大柏地的胜利台里面开群众大会,有借条的,就拿借条退还;没有借条的,只要你讲得出拿了什么东西给红军吃,就一一退还。在大柏地圩上退还了3600块大洋!”乡亲们非常感动,纷纷称赞说:“红军说话算数,丁是丁,卯是卯,我们信得过!”有很多青年当场踊跃报名参加红军。

1933年夏,已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大柏地。这天午后,雨过天晴,一挂彩虹高悬天上,群山苍翠欲滴。毛泽东回忆起当年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的场面,心潮澎湃,诗兴盎然,吟就《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在大柏地,毛泽东分别以军事实践和文学创作的方式,诠释了革命斗争的艰辛与理想的光辉,成为党史中的重要篇章。

“瑞金是个好地方”是毛泽东对瑞金这片红色热土的深情赞誉,也沉淀为瑞金人民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新时代新征程,瑞金这座承载荣光的红都,正以昂扬的气概,从多个维度诠释“更好看”的深刻内涵。

当前,瑞金市瞄准“1+3+N”主导产业,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海西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等,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4年,瑞金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赣州前列。连续两年获评全省市县综合考核二类县(市、区)第一等次。

随着赣州瑞金机场成功试飞即将通航,瑞梅铁路绵水特大桥连续梁合龙和武阳大桥T梁架设均创下全线第一纪录,瑞兴于快速交通走廊(瑞金段)全线最长大桥大汾大桥全幅架通……随着瑞金的交通愈发畅达,也助推了红色旅游持续火爆出圈。2024年,瑞金市全年共接待游客247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4亿元,共和国摇篮旅游区重要节假日闸机客流量均在全省红色景区中排名第一。

百年征程,薪火相传。中央苏区时期,瑞金人民倾其所有支援革命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付出巨大牺牲。今天,红都儿女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新征程,用智慧和汗水,酣畅淋漓地续写“今朝更好看”的壮丽篇章。

(文字整理:记者袁源 胡瑾 穆宇清 刘瑞岚 通讯员杨琦 钟燕林)

瑞金大柏地战斗旧址。

中央苏区党的自我革命路径

□李明胜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品格塑造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党以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的姿态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本本主义,破除局部执政实践的懈怠风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为新时代党传承革命老区红色基因、赓续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提供了历史镜鉴。

规范自我革命的组织路径

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把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工作提上了日程。根据这一决议精神,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加紧了对党员的监督和对违纪案件的查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更大的考验摆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面前:苏区广大干部能否过好金钱、权力关,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正是基于对这个考验的异常清醒,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工农检察部,讨论通过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条例法令,规定了工农检察部的职责等内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条例,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设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工农检察机关工作形式也日益丰富,例如悬挂控告箱、建立突击队、设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组织群众法庭等,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监督惩处网络。

为了进一步规范党的纪律监察及惩治贪污腐败工作,193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成立监察委员会。”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成立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明确了中央党务委员会的职责,并摸索出了一套“三步走”执纪模式。

第一步“先礼后兵”模式。即以政策攻势为切入口,组织突击宣传队深入各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苏维埃法律,在《红色中华》《斗争》《青年实话》等报刊开辟《铁锤》《警钟》《黑板》等专栏,对群众揭发出来并经查实的贪污犯罪问题一一予以曝光。

第二步“立人先立己”模式。即从中央机关领导干部查起。据《红色中华》报1934年3月27日刊登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一文载:“经过二个多月,获得了大的成绩。所检举的机关有中央总务厅、财政部、劳动部、贸易总局等17个,被检举的人员有43人,共查出贪污公款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

第三步“由下而上”模式。即在苏区掀起群众性检举揭发运动,对有严重问题者,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公审判决。如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2000元;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这些都是苏区工农群众监督检举的结果。

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等人共同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这个法令共4个条例,确定了贪污罪、挪用罪、浪费罪的概念和惩处罚则。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威慑作用。

开辟自我革命的思想路径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扭转党内的错误倾向。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这次党内批评开辟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路径。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撰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强调:“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批评的对象应是原则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进一步完善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思想武器运用的方式方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还被运用于遵义会议前的系列会议,例如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在遵义会议上,参会者对少数犯了“左”倾错误的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现象。遵义会议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评价了第五次反“围剿”,指出了问题,分析了错误,有效地解决了党内争端,做到了民主团结,避免了党内的分裂。

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在工农红军营地发现:“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毛泽东曾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树立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

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遵循,使党在自我革命过程中能够客观地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自我革命策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和红军中部分同志忽视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在讨论问题时开口闭口“拿本本来”。针对党内出现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写出《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予以回击,强调了调查研究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对当前党内存在的本本主义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

为准确把握赣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毛泽东以“甘当小学生”的姿态亲自前往赣州寻乌、兴国和上杭才溪等地开展全面细致的社会调查,仔细研究当地的土地状况和阶级状况,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向当地的农民、杂货店主、教师等“可敬爱的先生”虚心请教,写出《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期间,党内上下兴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刘少奇、陈云在深入工人队伍里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苏区的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存在脱离苏区实际的问题后,在《斗争》等刊物发表文章,领导修改《劳动法》,指导基层工会组织根据新的《劳动法》和苏区实际情况,与企业主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苏区干部在毛泽东等同志影响下普遍形成深入农村开展实地调查的务实风貌,党内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风气有所改善。苏区群众在与党的接触中真实了解到党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随之提升。

借谷运动:

百万担粮食背后的红色力量

□邓强 段刘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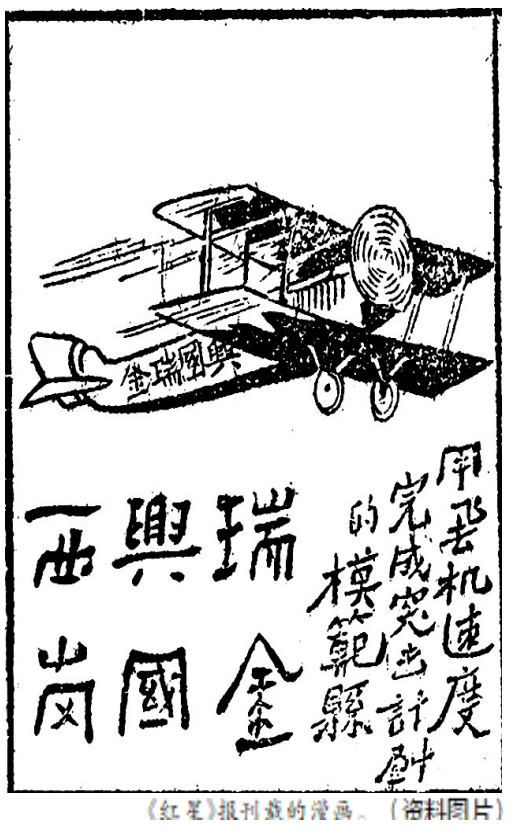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粮食工作,把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粮食问题视为革命战争胜败的重要条件之一。1933年春至1934年秋,中央苏区先后开展了3次借谷运动,向苏区群众借谷达100万担,有力保障了红军及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的粮食供给,为支援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第一次借谷20万担:广泛动员,迅速完成

1932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四次“围剿”,对苏区群众实行“大烧、大杀、大抢”,烧毁房屋数万间,抢去谷米数十万担,造成“群众损失不可计数”。加上粮食因灾歉收,一些奸商趁机囤积居奇,粮价飞涨,红军粮食供应开始出现困难。

1933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强调要集中一切经济力量,借20万担谷子来帮助革命战争。2月16日,《红色中华》报专门刊登文章《借二十万担谷子给红军》,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借谷任务。3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训令《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训令要求“限三月份内各县要一律将群众借谷一事办完”,并从保护群众利益出发,制定了借谷办法。比如,根据当地实际情形和群众出谷数量决定借谷分配数量,不搞“一刀切”;对老苏区、新苏区、边区等区别对待,以群众革命意识及受反革命摧残抢劫程度等决定借谷数量。同时要求各级苏区政府以演新剧、贴标语、出画报等通俗易懂的形式,抓好宣传鼓动工作,“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了借谷票,群众交来稻谷,经办人在借谷票上填写借谷数量,加盖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及经办人印章作为凭证。持有借谷票的农民,可以抵当年土地税,对抵税有余的,还可以向苏区政府领回现款。借谷实际工作中注重加强监督管理,禁止贪污、浪费,对卖出谷子所得款项,做到专款专用。

第一次借谷运动坚持实事求是,宣传动员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借谷20万担的任务很快完成。苏区群众中涌现了一批“借谷不要收据”的模范个人和超额完成借谷任务的模范县区,《红色中华》报以“踊跃借谷给红军”“退回谷票的模范”等为题,宣传报道群众踊跃借谷事迹,树立正面典型,为后续借谷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红星》报刊载的漫画。(资料图片)

第二次借谷24万担:多措并举,基本完成

1934年4月,广昌战役打响。红军战士经过18天苦战、血战,作为中央苏区北大门的广昌最终失守。随着战事接连失利,中央苏区大片领土丧失,战争形势日益恶化。为应对这种不利局面,红军加大了“扩红”工作力度,军粮需求也急速扩大。

1934年6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号召——《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要求紧急筹集粮食供应红军。当时苏区稻谷未熟,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手中余粮也不多。通告发出以后,借谷数量没有达到预期。为按期完成任务,苏区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调动各级职能部门发挥效能。一是加强宣传鼓动,把“收集24万担谷子”与“扩大5万红军”的口号作为“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广泛宣传动员,凝聚干部群众共识。二是要求节省运动与借谷运动同步开展,不以借谷代替节省,在完成节省计划的同时完成借谷计划,二者不可偏废。三是防止和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行为,纠正向地主富农姑息妥协的做法等。四是党对粮食动员负绝对责任,注重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作用,采取更多有效办法,调动各级粮食部、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发挥效能,按期完成“动员5万红军,24万担粮食”的战斗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动员,苏区群众与红军共克时艰,节省每一粒粮食保障前线供应,最终基本完成了借谷24万担的任务。兴国县和瑞金县提前超额完成借谷任务,受到中央人民委员会嘉奖,赠给兴国县“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动员”红匾,赠给瑞金县“粮食动员的模范”红匾。

第三次借谷60万担:热情高涨,超额完成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此时,数次反“围剿”斗争对苏区各类物资消耗很大,红军供给越来越困难。红军部队的战略转移,需要补充大量军粮,如何筹集粮食成为首要问题。

1934年7月19日,中央粮食部召开第一次各省县粮食部长与仓库主任联席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半年来粮食部的工作,部署当年秋收后动员60万担借谷和征收土地税工作。在毛泽东、罗迈(即李维汉)、陈潭秋、王首道等同志见证下,各县粮食部长签订了秋收借谷竞赛条约,第三次借谷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在9月15日前完成秋收60万担借谷,同时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24万担的借谷在1934年土地税中归还,60万担借谷在1935年与1936年土地税中归还。当年秋收,苏区粮食产量普遍增长一成左右,农民手中有粮,加上苏区各级党组织充分动员,广大群众拥护革命战争的热情高涨。9月30日,陈潭秋在《斗争》报发表《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指出“秋收借谷动员完成六十八万八千余担,收集五十八万八千余担(未收集的大部分是迟熟的地方还未割禾)”。至此,第三次借谷运动超额完成。

在苏区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第三次借谷运动政治动员充分,把借谷运动开展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很多群众自愿交回政府发放的借谷票,要求把借谷改为节省,借谷不要国家归还。红军长征后,一些尚未兑现的借谷票就留在苏区群众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继续履行红军当年的承诺,按时价兑换粮食或者现金。

中央苏区的三次借谷运动,为前线红军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应,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斗争,也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粮食作为当时苏区群众的主要生活物资和收入来源,苏区群众倾尽所有帮助红军,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无不体现了苏区群众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苏区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